

浅谈抗战时期重庆“上下江人”的风俗文化融合*

刘凤凌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文博学院,重庆 400047)

【摘要】抗战时期,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下江人”涌入重庆,由于各自的社会习俗、文化背景、思想观念等方面有差异,使其在与重庆本地人相互接触的过程中,产生了抵触、排斥却又交流、融合的现象,并且在不断的文化碰撞中出现了“上下江人”的风俗文化融合。主要表现为重庆的饮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语言文化的交流、风俗习惯的改良、思想观念的变化。

【关键词】重庆;“上下江人”; 民俗文化; 融合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1-0113-03

抗战时期重庆人习惯把来自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地方的外省人,称呼为“下江人”,自己则称为“上江人”。只是习惯称谓,并无侮辱之意。但往往会闻之隔阂,误会由此产生。重庆市警察局曾为此特令查禁呼喊“下江人”之谓。^[1]抗战期间出现了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向西部地区的人口流动潮。陪都重庆成为内迁人口首选的聚集地和落脚点,大量“下江人”涌入重庆。“下江人”成为当时获得广泛认同且有明显文化特征的社会群体。人口迁移是多种信息的载体,把一种文化从迁出地带进迁入地,造成文化空间上的流动,带来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正如《黔游记略》指出:“大抵侨民流移,其初各从所习,后来居处日久,与当地土风相互渍染,因而揉杂成为一方一地的俗尚。”^{[2](P476)}重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与包容的格局。

一 饮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抗战时期人口大量迁渝,使得重庆的饮食文化空前发达,饮食兼收并蓄,除本地人的餐馆外,外地人开办的餐馆也纷纷开张。张恨水先生这样形容到:“渝市大小吃食馆本及多,几为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客民麇集之后,平津京苏广东菜馆,如春笋怒发,愈觉触目皆是”。^[3]据1943年重庆中西餐业同业公会会员的记载,当时重庆有中西餐食店260家,其中小洞天、颐之时、九华园、醉东风等川菜馆110户,占总数40%;有三六九、五芳斋、陆稿荐、状元楼等江浙馆45家,占总数的17%;有同庆楼、华北春等京津馆27户,占总数的10%;有广东的冠生园、大三元等粤菜馆15户,占总数的6%;还有鄂菜馆、豫菜馆、鲁菜馆、湘菜馆、徽菜馆等33户。此外还有30户俄、英、美、法等外国人开办的西餐馆。^{[4](P153)}形成了南北味、中西菜并存的繁荣局面。

随着各地人口云集重庆,各地风味饮食也不断

涌入,打破了以前川菜较为单一的饮食风味。内迁人们都有自己的口味,于是标明自己特色的各类美食也跟随他们汇集到了重庆。重庆可谓是“美食之都”,在街头可以品尝到各地美食,如广东糕点、福建海鲜、湖南辣子鸡、北京烤鸭等。人们广纳各地风味,兼收并蓄,荟萃了各大菜系。省外的有江浙味、广东味、湖北味、贵州味、京津味、湖南味等;省内的有成都味、泸州味、乐山味、内江味等。当时重庆的各地风味名菜还真不少,如“小洞天”的清蒸肥头、“久华源”的清蒸火腿、“老四川”的灯影牛肉、“一四一”的毛肚火锅、“陆稿荐”的麻雀熏鱼等。^{[5](P76)}这些菜品做工精细,用料考究,当时赢得了广大食客的喜爱。

此外,由于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人们的餐饮习惯也逐步发生了变化。如重庆人一般一天吃两顿干饭,后来仿效“下江人”,变为一干两稀。如重庆的沙坪坝地区,受外来食俗文化的影响,早上吃干饭的人开始减少,代以豆浆、油条、包子、馒头之类。饮食习惯的变化,说明在当地人来说,内迁者带来的餐饮生活无疑是合乎时尚和更加健康的。

二 语言文化的交流

研究方言的学者指出:“移民一方面造成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又使不同地域的文化发生交流,产生新的文化。人口的迁移在促进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使语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6](P15)}中华民族的语言极为丰富,有着众多的方言,各个方言中又因地域不同而形成许多语言习惯。这种现象,一方面是语言发达的表现,但也对不同区域人民思想文化交流造成了障碍。人口的迁移在促使文化发展的同时,使语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语言的交流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许多外地人入居重庆,“孩子长

收稿日期:2008-11-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大后方人口变迁研究》(项目号05XRK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凤凌(1981-),女,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大,说着圆滑如鸟啼的四川方言,使父母的耳朵发胀”。^{[7](P17)}而很多重庆人跟外来人较长接触之后自己的“土话”也多了些“国语”的味道。张恨水在《重庆旅感录》中写道:“自去年十月起,脚下水与脚底下货充溢重庆市上。市招飘展,不书南京,即书上海。而小步五支街头,南北方言,溢洋于耳。客主之势既移,乡下之别,殆亦维持不易矣。”^[8]在日常交往中,为了彼此能够明白对方的意思,当地人和迁入人口都操着夹杂着浓重方言音调的所谓“国语”进行交流,冲击了原本各自为营、自成体系的各地方言,淡化了人们的地域观念,使得“五四”以来的“国语”推广运动收到了意外之效,也从客观上促进了语言的发展和人们之间的文化交流。1944年,陈立夫在教育部主办的陪都国语运动宣传周开幕式上特别提到:“抗战以来,东北、东南人口大量集中于西南、西北,此次大迁徙,于国语统一上厥功殊伟。语言相同感情接近,为民族团结之一大因素。故国语统一在政治上收获实更大于教育意义。”^[9]

重庆的地名也在不同语言文化的交流、碰撞之下不断推陈出新。抗战期间重庆出现了大量以外地地名命名街道的情形。当时重庆主城区出现了以外来进步名词命名的街道,如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中山路等,这些名称至今还在沿用。重庆北碚当时划为迁建区,一些重要的国家机关、大专院校、文化团体陆续迁入北碚,使其成为外地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陆续建成的街道上出现了北京路、广州路、庐山路、南京路、上海路、天津路、武昌路等。说明人口迁移带来的地域语言文化的交融,不仅使语言文化呈现出丰富性,也使它具有广泛性和进步性。

三 风俗习惯的改良

随着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的传入,旧的不良习俗得以改良,新风气和习俗逐渐得到了确立。抗战时期,民风日开,外来移民带来了新的服饰装扮,既美丽又方便,重庆民众在服饰打扮上纷纷仿效。以前重庆人爱用白布缠头和打赤脚。大量外地人的迁入带来新时尚加上当局的大力纠正,后来在都市区,已经很少见到缠头赤脚这种现象了。当时男子穿长袍者也渐少,留“东洋头”,着淡灰色布料中山服者开始增多,冬季多穿皮西装。夏威夷衬衫当时在重庆成为了流行时尚之物,凉快方便,适合重庆夏季炎热的天气。城镇妇女穿旗袍、戴戒指,长袜皮鞋,短发戴帽,并涂口红,烫发。鞋子从绣花缎鞋到平底、中跟、高跟皮鞋等各种时髦装扮也不时出现在城市的街头。说明人们的服饰习惯在悄然发

生变化,人们的服饰装扮日益时髦新潮。

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必然改变不良的风俗习惯。重庆市民也深受外地移民一些先进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加上重庆是战时首都,国民政府在三十年代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这对于革除重庆原先的一些陋习,如吸毒、卖淫、赌博、偷窃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以前重庆人爱吸食鸦片,后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力整治,公开焚毁鸦片,严惩烟贩,并训诫烟民。使重庆吸鸦片者日少,许多烟民成了壮丁,丢了烟枪,换了步枪。又如重庆的大小浴室均设有所谓的家庭间,携家眷同洗,固属正常,就连召妓戏谑,也不为人所忌,这是当地的特色,但此举究属有碍风化,不合礼数,重庆警察局特于1939年3月发布公告,取缔男女同浴的风俗。^[10]人们的一些不文明习惯,也因内迁文化的传播得到了一定改善。就卫生习惯而言,1940年,陪都发起了取缔随地吐痰及随地大小便的运动。医务工作者在集中的时间内向民众宣传随地吐痰的害处,号召大家讲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这项运动虽然没有深入开展下去,但此举开创了改良卫生习惯的先河。

四 思想观念的变化

抗战时期由于大量外来人口和文化的迁入,一批高素质的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的到来,带来的新文化、新思想、生活习惯,开阔了重庆民众的眼界,人们思维也更为活跃起来,开始接受更为先进思想和文明的洗礼。

婚姻观的变化。从前人们普遍遵从传统婚姻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而抗战时期大量新思想,特别是婚姻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涌入使更多的人勇于打破传统。新式学校内迁及外来人口的涌入,带来了开放的现代文明,大量宣传婚姻自由的书籍被介绍到大后方重庆,教授们也在大学讲台上引导学生为反对包办婚姻而抗争。校园内男女同学广泛自由交和,成为常事。人们开始大胆追求自己的婚姻幸福,有了更多与世俗抗争的勇气。譬如1944年2月27日,重庆《中央日报》广告版登出了这样一则启事:“萧仁源、余敏离婚启事:我俩因工作关系不能在一地同居,故协议离婚。”^[11]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和选择机会,打破原有的婚姻圈,使婚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上江人”也与在过去被看不起的“下江人”结婚,大批本地姑娘与外地郎成亲。另外新兴的集团结婚也开始得到市民的认可。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0年,重庆共举行三届集团结婚,有62对新入参

加。^[12]1942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内政部还特别发布《集体结婚办法》,表明对此项推行工作的重视。重庆市集团结婚,从1936年3月至1949年9月前共举行了52届。起初市民对此持观望态度,第一、二届时只有9对和5对参加,之后不断增多,到1949年元旦第49届,参加者竟达91对。^[13]^[14]参加人数虽然有限,但它毕竟说明新的婚礼习俗开始被重庆人所接受。

现代女性观念意识增强。抗战时期大规模的人口变迁,高校内迁及西部现代文化教育的蓬勃开展,使大后方社会风气日趋开化,昔日男尊女卑、女性备受歧视的局面大有改观,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使广大女性自我意识开始加强,开始主动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尤其是接受现代教育和参与社会实践的职业界、知识界女性。她们首先从旧礼教中清醒过来,挣脱出来,走出家门,进入工厂,投身抗战,组成抗战宣传队和文艺队等。子冈在《妇女百像》中写道:“女工在重庆怕有数万人,纱厂、被服厂、布场、烟场、甚至兵工厂员工眷属也做着些轻活”。^[14]一些女学生毕业后奔赴抗日前线,为国家民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

民族意识也随着抗战和“下江”文化的到来,开始深入大后方重庆。如春联与门神,本为普通的迎春物品,也被更新为含有抗战教育意义。门神被绘制成抗战门神,提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所洒的

金钱上写有“打倒日本鬼子,消灭大小汉奸”的字样。^[15]“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也成了当时重庆最流行的口号。抗战和内迁使民众民族意识大增,人民开始认识到,先有国才有家,只有维护国家民族生存,自己和家人才可能真正生存下去。

五 结语

列维认为,一旦现代化和缺少现代化的地区之间的人们彼此交往,“不论是否施加外力,现代的模式都会被非现代社会吸收”。^[16]^[17]抗战时期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大量外来的移民群体与本土居民必然会文化交流,观念碰撞,习俗交融,必然使当地人打破狭隘地域观念,革除原有的一些陋习,逐渐吸收或认可外乡人的文化观念和习俗。“上下江人”不同的民俗文化彼此撞击,互相适应,从而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交融的新东西。这种由人口变迁所带来的文化撞击与融合,正是文化互动的必然结果。在战时的重庆较为显著,主要表现为饮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语言文化的交流、风俗习惯的改良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这种有益的文化融合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的影响是长远而深刻的。这不单是社会表层的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动,更是社会深层的人们思想观念和意识领域中的变动。这种由表及里的变动,为重庆的社会现代化的转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这也极大地冲击了先前封建、愚昧、保守的风气,使社会逐渐趋向更加开放,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下江人”警局通令查禁呼喊[N].大公报,1939/2/06(3).
- [2]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市志.社会志[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 [3][8]张恨水.重庆旅感录[J].旅行杂志,1939,1.
- [4]转引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M].重庆出版社,1995.
- [5]政协重庆渝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重庆渝中区文史资料(第9辑)[M],内部发行.
- [6]周振鹏等.方言与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7][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
- [9]国语运动周昨开幕,陈教氏讲国语统一功效[N].大公报,1944/03/20.
- [10]思红.重庆生活片断[J].旅行杂志,1940,4.
- [11]萧仁源、余敏离婚启事[N].中央日报,1944/02/27(4).
- [12]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政府[Z],88/29.
- [13]重庆市文史研究馆.巴渝故实录[M].上海书店,1994.
- [14]子冈.妇女百像[N].大公报,1942/7/25.
- [15]抗战门神[N].大公报,1939/11/24(3).
- [16][美]M·J·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M].吴荫译.知识出版社,1990.

叛乱和镇反运动中各级干部和民兵根据政府的法律、法令及政策所进行的合法行为进行报复翻案、算

旧账、索取人命金等非法活动,更不能以调解名义对已封存的发主改革以前的历史旧案进行翻案。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周自强.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2]四川政协文史委员会,凉山州政协编.凉山彝族文史资料专辑[Z].2000.

Discussion of the Civil Mediation of Liangshan Yi People

HEI BI-A wu, LI Jin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The society of Liangshan Yi People under slavery was in absence of unifie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organs. So the mediation of the disputes between people were mainly mediated by the respected community people in accordance with customary law. Such mediation has a deep mass base in Liangshan, so it's very important to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unity. However, as it originated from slave society, there are also negative factors. We should hold on the principle of discarding its dregs, and choosing the best. We should actively guide it, and make it serves the building of harmonious and stable Liangshan.

Key words: Liangshan YI People; Civil Mediation; Social Stability; Harmonious Development

(上接115页)

An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ustom and Culture of Chongqing People Living in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Yangzi River dur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

LIU Feng-ling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Abstract: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a great number of people who lived in the downstream of Yangzi River moved into Chongqing. The local people first conflicted with the outsiders since they had different social custom, culture background, and thoughts. After a long period of conflict, however, these differences were integrated in some aspects. In this case, the integration of custom and culture emerged in the culture exchange,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he changes in diet, language, custom, culture, and thoughts.

Key words: Chongqing; People Living in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Yangzi River; Custom and Culture; Integration